

124060

1530/01

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內部發行)

K250.6
3739

K250.6
373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暨沈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62年·沈阳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Wenshi Ziliao Xuanj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暨沈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公安厅印刷厂印刷

字数, 101,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¹/₁₆

1982年9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501—6 500

统一书号, 11090·139

定价, 0.54元

编辑凡例

一、本选辑的编刊，是为了积累、保存历史资料，并用以推动撰写史料工作的开展，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二、本选辑所选的资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研究参考价值，即可刊登。

三、本选辑所刊登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内容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

四、本选辑所刊登的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五、本选辑对于来稿，可加以综合、删节、选录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 倒袁活动与东北革命军始末……………宁 武 (1)
- 张学良将军一夕话……………卢广绩 (6)
- 郭松龄反奉的片断回忆……………鲁穆庭 (13)
- 西安事变中的兰州情况……………周达夫 (23)
- 张作霖与阎、冯、蒋、李
- 战争纪略……………鲁穆庭、王理寰、谢珂 (34)
-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见闻……………佟济生 (51)
- 辛亥高力门起义及其前后……………武 扬 (65)
- 短稿两篇
- 辽阳东乡农民反对盗卖国土……………徐廉奎 (73)
- 奉天省第一个学堂……………孙祖昌 (75)
- “九一八”前的东北大学……………安文溥、陈国庆 (77)
- 盛京施医院创立纪实……………刘仲明 (81)
- 记袁金铠……………衍 川 (95)
- 安东柞蚕丝绸业发展简史……………安阳市工商联 (110)
- 跨海运械的回忆……………李纯华 (117)

倒袁活动与东北革命军始末

宁 武

(一)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袁世凯特务刺死后，全国舆论哗然。在这种有利于革命再起的情况下，孙中山先生由日本到上海，一天走访黄兴，并邀少数同志座谈，提出利用群情激昂机会，到内地成立革命军政府，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声讨袁氏祸国殃民罪行。当时孙先生很激动，谈出许多进行办法。但黄兴借口人心厌乱，不同意他的主张；在座的陈其美等人也附和黄的意見，弄得无结果而散。在上海的各省不妥协的同志，时赴孙先生处请教。孙先生看到他们继续革命的情绪很高，指示他们各返原籍进行准备工作，说出很感动人的“革命不能怠工”的话。奉、直、鲁三省同志本着孙先生的话，先后聚集到大连，以研究实业为名，设立革命地下机关，名为“实业研究会”。同志们接受过去的教训，认为有加强组织的必要，于是成立革命工作联合委员会，以刘雍、吴大洲、宁武为召集人，推出委员七人，下设总务、文书、军事、宣传、联络、训练、组织七个小组，由委员会物色青年同志担任正副组长。同时一部分同志如邵兆中、刘乾一等三十余人，经上海开明资本家沈绶云接济款项，去吉林省一面坡开荒。借以联络群众、组织武装力量。

大连的倒袁活动也得到沈先生不少资助。在工作进行中，发现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宗社党肃王和升允等阴谋复辟，再建立所谓大清帝国。未几又发现德帝国主义在山东主使豢养的亡清小恭王也作同样活动。同志们认为在倒袁运动中，应首先击破这种复辟阴谋。当年秋得情报，东边著名土匪黄四懒王所部三四百人，被日本和宗社党所利用。黄四懒王有相当的号召力，八月上旬，日本和宗社党联络，从朝鲜运枪械供给他，约定在安奉铁路的五龙背和草河口两车站交接。我们即刻派王云峰同志先到他的家乡岫岩，集合联庄会丁勇二十余人，分头截夺这批武器。当时大连革命机关已购置毛瑟枪二百五十支，小手枪二十支。王偕同少数旧部往指定地点进行工作。走后一星期，从日本报纸上得到不幸消息，说他们在五龙背车站附近，被中、日军警合围，死伤殆尽。同志们感到无限悲愤，斗争意志愈形坚决。

一九一四年春，张作霖把残害人民的帮统金万福枪决了。金的长子金鼎臣由日本浪人保护跑到大连，不久在日人勾引下参加了宗社党。金原籍营口田庄台乡，是辽西窝匪地区，利用乡土关系，啸聚亡命，组织武装暴乱。当时探明日本和宗社党供给金一批武器，用大风船从大连老虎滩起运。石磊同志即率王青山、刘跃尘等二十三人，乘风船跟踪，从海上截夺。工作开始很顺利，船到金州湾时，正是夜间，日本小兵舰来袭击，当被石等击毙其守备队和警察各一名。随着小兵舰用快速度航行，把我们船只撞坏，同志们落海，全体被捕。这些被捕的同志不久由金州日本民政署引渡到中国的复县公署，被诬以海盜罪名光荣牺牲。石磊在临刑前演说，揭露了日本及宗社党的阴谋，闻者深受感动无不下泪。

一九一五年冬初，上海在陈其美主持下，发动海军肇和舰起义，东北一部分革命党人前往参加。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戒备甚严，乃决定先刺杀郑汝成。十一月十日郑赴日本领事馆，

途中被东北同志王晓峰、王铭山击毙。两同志正在续子弹，适英国巡捕（印度人）赶来，用铁棍把他们击伤捕获，当即引渡到镇守使署军法处，用铁链穿他们的肋骨游街示众，不久折磨而死。同年十二月又袭击肇和舰，东北青年柴志安等二十一人作内应，不意岸上步兵毫无动作，这些同志都牺牲在黄浦江中。

刘雍、宁武在次年春到东京，那时中华革命党已经成立，虽然加强组织性，党纲和党章比较以前充实，但有两种情形，一是不团结，即所谓孙、黄分家问题，仍然有第一党第二党的怪称。二是经济无来源。当时孙中山先生生活很困难，住在日本友人头山满的小别墅里。黄兴住的是自营的比较堂皇的西式公馆。革命的活动和同志们的生活所需，完全靠廖仲恺同志从海外华侨募来的款。由于华侨商业不景气，募款也不容易。宁武、刘雍将敌方情形及同志们牺牲经过报告后，孙先生即派明治大学的东北青年徐宣三、乔根化名满人，渗入升允幕中，进行策反工作，由内部打垮宗社党复辟阴谋。不久徐、乔两人随升允往旅顺口，向他说明日本的阴谋，升允始知受日本利用，走上卖国道路。他忠告肃王后，即往青岛久居不问人间事了。肃王到了日本，把他女儿金璧辉送给日本军官作养女，改名川岛芳子。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蔡锷从北京脱险跑到日本东京，面见孙先生请教倒袁计划。居正、谢持等人认为蔡是劝袁作皇帝的首要人物，阻止蔡和孙先生接触。蔡听到些怪话，一愤往越南河内，旋即回到云南，成立了讨袁护国军，声势浩大，震撼长江和珠江流域。护国军开到四川边境时，孙先生还和从前一样苦闷。居正把持党务，和日本浪人豈野勾结，在他的大将日本通陈仲孚奔走下，日本参谋部允许协助，暗示以华北、山东为条件。当时日本加入协约国，占领了青岛，还要乘中国内战，取得胶济铁路经营权，所以，援助了居一师团的旧俄式枪炮（在旅大有存货），还给几架旧式教练飞机。同时，

在陈仲孚的愚弄下，居又聘请些日本顾问（日本参谋部的授意）。当时知道居内幕的人很少。居正成立东北革命军，主要是他别无去处，想利用东北同志把军司令部组织起来。东北同志只有少数人知道他的企图，孙先生虽也知道，但未向东北同志说明，只扬言准备返上海。但东北同志相约，决不参加东北革命军，一心支援山东同志吴大洲在周村成立的倒袁军，将枪马从东北运进山东。不久，居正到青岛，派他的日本通陈仲孚来大连。陈和朱霁青有旧关系，朱即秘密派他的同学段文祥、杨子厚等潜入东北各地招兵买马，约得千余众，从大连搭船到山东，在潍县成立了东北革命军总司令部，居自命为总司令。朱成立第一师，吕子仁为第二师，白子明为第三师。山东督军张怀芝，受了吴大洲部的打击，无兵再往东派，诸城还有东北革命青年军一旅（司令马海龙，参谋长刘一飞），同吴大洲一起倒袁，并发起驱居运动。居把潍县南关开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居住营业。在山东同乡反居驱逐亲日派时，居的东北革命军从未对敌作过有力的战斗，只是不断和老百姓要钱，以充军饷。朱的团长王贯忱是奉天海城县的小匪头，时常派人四出强抢绑票。潍县县长左雨农老同志是山东人，以此质问居正。居就把他禁闭在副官处。朱霁青第一旅旅长尹锡武闻讯，大为震怒，带兵到居的司令部，将左雨农强行劫出。陈仲孚私党日本通凌润青、王贯忱都是朱的旅团长，为顾全居的面子，即向尹锡武开火，要索还左雨农。但尹在关外时，隶冯德邻（麟阁）部下，战斗力比凌等为强。最后由于别的同志和解，一场风波始告平息。居此时电邀在上海的许崇智来任参谋长，蒋介石为参谋处长，但许拒之未就，蒋到后不久又跑回上海。

（二）

蔡锷指挥所部攻四川时，四川督军陈宦响应了护国军，痛

斥袁氏祸国的罪行，继黔、桂之后，与湖南的汤梦铭同时宣告独立。陈、汤是袁世凯忠实走狗，袁以为有此左右手，可以黄袍加身。不料这时都背叛了他，遂一怒而病，死于新华宫。袁世凯死后，反对帝制的讨袁战争也就结束了。这时居正认为朱霁青无能，吕子仁、白子明军队已叛变，遂妙想天开，到济南和督军张怀芝谈判，要求给他山东省长，就可以无条件解散东北革命军。不料竟被拒绝，于是跑回上海，和他的日本通陈仲孚，勾结日本商人办起交易所，居然成为富商、大地主了。朱霁青仍在潍县，于一九一七年春，派他的参谋长赵殿甲（后改名锄非），副官长赵化宣（此二人都是辛亥年在东北地方上杀革命同志最凶的反动特务），一往北京，一往南京，求段祺瑞和冯国璋收为部下。不久赵殿甲从北京返回，段要求朱通电拥护他，后来把朱改编为正规军。赵化宣从南京回来谈蒙张宗昌帮忙，冯副总统亦允许收编。张宗昌要回山东探亲，朱准备迎接。有老同志反对朱通电拥段，更反对欢迎暗杀陈其美的仇人张宗昌。朱听到有实力的老同志难为他，不敢叛变革命，于是终止了。后来，朱霁青被山东军阀张怀芝调到济南整编，结果全部被缴械，他本人也下了监狱，团长王贯忱被枪决。吴大洲所属谢宝轩部改编为新军团长，驻天津小站。这年六月张勋复辟，谢宝轩和十六旅旅长冯玉祥合作讨张，后来陆军总长段芝贵发现谢部是革命军，而且是一支善战的队伍，恐不为己用，下令解散。调谢为陆军部参议，送军官学校深造，以掩人耳目。谢年二十六岁，乃一小手工业家庭出身，善骑射，参加同盟会后，学有相当文化。段芝贵邀他作驻沪特务，被他拒绝，后段以便宴把他毒死，可能发现他是暗杀郑汝成的主持人。

张学良将军一夕话

卢广绩

记有关杨宇霆、常荫槐之死和收买日本
政友本党两件事的片断，作为对王家祯同志
的《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一文的补充。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我由沈阳到北京，没有多久，就和一些同志组成“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那时，张学良将军任军委会北平行营主任，住在顺承王府。救国会成立以后，有许多事情我们须向他请示，要他支援，所以常有些过从。这年冬季一个夜晚（时日记不清楚），我同阎宝航、王化一、王卓然几个人往访张学良将军。会面以后，除谈些有关当前中日问题以外，还扯到东北的一些往事。那天晚上他特别兴奋，滔滔不绝，越谈越起劲，竟忘掉夜幕降临，由晚九时谈起，一直到翌晨早六时，窗已放亮、雀已出叫才中止，可以说是一次“竟夜谈”。在这一夕谈话中，涉及东北政治、军事、外交的内幕，有许多事情都是我过去闻所未闻的。可惜那次谈话当时我没有用笔把它记下来，到今天已是三十年前往事，有的已不复省记，惟关于杨、常之死和收买日本政友本党这两件事，尚萦绕我的脑际。现在如实地把它记下来，可能不那样完整，或者有所出入，希望同我一道会见的同志给以补充和订正。

一、有关张作霖之死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张作霖乘专车由北京返沈阳，次日火车经过皇姑屯站至北宁、南满两铁路立体交叉地点，日本帝国主义者预先埋伏的炸弹爆炸了。张作霖受重伤气息奄奄，比及用汽车运到大帅府（即张作霖的住宅）后，军医处长王宗承，即邀请小河沿盛京施医院院长雍大夫（W. A. Dr. Young）为他诊治。不料雍到帅府时，张已停止呼吸，无法挽救。王宗承在施医院学过医，同创办施医院的英人司督阁（Dugale Christie）老大夫有师生之谊，同雍院长也是很好的朋友，常有往来。张气绝时，雍大夫正在场，身亲目睹。当时王处长诚恳地嘱咐雍大夫说：“这件事关系太大，希望你严守秘密，如有人问时，千万不能说大元帅已死，只能说负伤罢了。”雍大夫为人尚忠诚，按照王处长的嘱咐，严守了秘密。当驻在沈阳的英国总领事问他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回答的。关于张作霖遇难的情况，沈阳的军政负责人已密报张学良将军，因此他就很快地返沈坐镇。诸事布置妥当，才发布张作霖死去的消息。虽然日本帝国主义者炸死了张作霖，但张作霖的生死真象外间都不明白，一切部署甚好，地方秩序如常，敌人阴谋未能得逞。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雍大夫因此丢掉院长职务，被迫回国的事。一九三四年我出国考察，次年八月从美国到英国，经朋友介绍到英国北部爱丁堡地方去游览，住在一位英国朋友饶柏森大夫（A. Robertson）家里。饶在沈阳施医院作过大夫，同我们许多老友，如高文翰、刘仲明等都是旧相识。在他家作客期间，他邀不少英国朋友——过去在沈阳作大夫和传教士的——同我会见。他们大都会讲中国话，真使我有“他乡遇故”之感。雍大夫也在座。他在沈阳时，我也认识。我问他：“你为什么回国，是否因为日本占领沈阳的缘故？”他答复我说，那是次

要的，主要原因是我在张作霖被炸时，对驻在沈阳的英国总领事说了谎话，就是按照王宗承处长所嘱咐的话说的。驻沈阳英国总领事认为我对大英帝国不忠实，不能再在那里继续工作，遂撤消我的院长职务，令我回国。当时雍大夫在爱丁堡执行医疗业，谈起往事不胜感慨。由于这件事我认识到：帝国主义者派遣医生、传教士、教师到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去，并不是无目的的，都尚有一定的使命；如果说他们只是为传播耶稣基督福音，帮助落后国家，同帝国主义没有任何关系，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二、枪杀杨、常的动机和经过

当张学良将军正式宣布张作霖死讯，讣告中外友好，并定期开吊时，东北地方政府同东邻日本的关系是微妙复杂的，虽然日本帝国主义者“夜杀其人，明坐其家”但还要作假惺惺的国际上的外交周旋。日本政府特派前驻中国大使林权助为专使，前来沈阳吊张作霖之丧。实际上是尚有其他使命，意在促使东北地方当局更能接近日本，不同南京国民政府靠拢，保持过去半独立的局面，以便于他们继续控制这个地方，进一步实现侵占满蒙、侵占中国的大陆政策。张学良将军当时对这点很清楚，同日本帝国主义者有不共戴天之仇，但迫于情势又不能不忍隐相与周旋，其痛苦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林权助完成他的吊丧使命，返回日本，在东京车站举行记者招待会，当时有记者问到东北情况。他回答说：“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这个谈话载在日本各大报上，经张的秘书译成中文给张看。张在同我们谈话时说：“我不甚熟悉日本的历史，但我对林权助讲话，确很注意。有一天，我从北陵别墅回城，路经鼓楼北，到商务印书馆，下车翻阅听陈书籍，恰巧看见有一本《东洋史》，

内中载有德川家康一段事迹，乃购一册回去阅览。对德川家康这一段史实，阅览的特别仔细。”据张对我们讲，这段史实内容，是这样：在日本幕府时期，权势赫赫的丰臣秀吉死去。秀吉的儿子继承了秀吉幕府大权。他虽年少英敏，但贪图享乐，不甚理国政，一切政务委其岳父德川家康来执掌。当时秀吉儿子想，他是能够控制他岳父的，认为德川家康不敢对他有何异谋，因此假以实权，自己可以更自由自在的来过着享乐生活。不意后来德川突然发动政变，竟杀了秀吉之子，取而代之，灭了丰臣氏，建立了德川幕府。张说：“看过这段日本历史，我当时在想，林权助为什么他说这番话？就联想到我们东北的内部情况。”他接着说：“老将死去（指张作霖），东北各军政领导人，拥戴我为东北保安总司令。在这中间，有的是老将旧部，有的是经我培育出来的新干部，对我可说绝大多数是真诚拥护的。但是因为我的年纪尚轻（时张二十七岁），身体又不好，也有的对我轻视，甚至桀骜不驯，特别是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人。杨在老将掌政时，作过参谋长、总参议和三、四方面军团长等要职。一九二五年郭松龄反奉，其原因很复杂，但郭对杨仇恨不满也是主导原因之一。郭失败后，老将对杨仍很信任，并畀以重要职务；而对我则因郭的叛变，时加斥责，虽有父子关系，但不如过去那样相信。而我同杨宇霆之间的关系，也有时意见参商。至常荫槐先为军警执法处长，三、四方面军政务处长，后又任北宁铁路局长，确实是一个精明干练敢作敢为的人。也就因为这个，深得杨的器重和信任，两人的关系极其密切。他们对我总是抱着藐视态度，对我有什么请示和要求都带有强制性和威胁性；尤其是常荫槐倨傲无礼，飞扬跋扈，并没有把我看成是他的长官，若以旧时代的话来说：真是‘快快非少主臣’。但我对他们总是尽最大克制和忍耐。在我就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时，还是升常荫槐为黑龙江省省长。当时万福麟为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常对万并不是相互尊重，遇事协商，而

是傲慢不恭，轻蔑鄙视。他在黑龙江时，编山林警备队，本来不是正规军，但杨宇霆给以大力支持，能得到优良的装备。为什么要这样积极抓军队呢？不能不使人生疑。杨宇霆在我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时，未安排他任何职务。一则感到他是老将的‘老臣’，地位很高，一时无恰当的位置。二则是我对他确有戒心。虽然东北军政重要措施，都征询他的意见，重要会议也请他参加。但是并非信任不疑，这是事实。看到林权助在东京答记者问的讲话和我翻阅日本历史有关德川家康幕府时代的史实，联想到东北当时的政治情况，我有些感到不安。加以当时杨宇霆虽无任何职务，但东北军政要人多其门下故旧，趋承奔走，门庭若市，甚至国内各省军政代表到沈阳的，也多往访谒。他是一个在野的人物，俨然同我‘分庭抗礼’。尤其是当杨给他的父亲作寿时，铺张扬厉，车水马龙，东北大吏荟集其门，炙手可热，真是盛极一时。”他还毫不思索地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祝寿，不断在想，假如杨、常取我而代之，可以兵不血刃掌握东北政权，莫非林权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我应该怎样来自处呢？我是等待如秀吉之子那样最后为德川所杀呢？还是先把除掉？事关杀人，尤其是要杀一个风云中的人物，一时是犹豫不决的。同时作这样事，也很难同外人来商量。有一天，我偶然同我的夫人于凤至谈，试探她的口气。她表示极端恐惧，并坚决反对。以后我就好久不再同她谈了。一个晚上，在卧室中，我又同于凤至说：‘为这件事，我们占一课。古人说，“卜以决疑”，今天我拿一块银元向高处连掷三次，落地时，假如三次银元的“袁头”都在上面，我们就决定把他们杀掉；否则，我们就不杀。我来掷，你来看。’结果掷了三回，落地时，都是‘袁头’在上面。但于凤至说：‘这不可信，因为银元两面可能有轻有重，袁头而轻，可能在上。’我当时说：‘既然你以为这样不可信，那么在现在重掷。要三次银元有字的在上面，我们就可以作最后决定，仍然由我来掷，你来

看。’结果三次银元有文字的又都在上面。我说：‘这样，我们可以最后决心了吧？’于凤至仍不同意。以后我就不再同她谈这件事了。我当时在想，既要‘先发制人’，也要‘当机立断’。杨、常两人当时的情况，我精神上感到极大威胁，此时不除，必贻后患。我对他们两人都恨之入骨，如芒刺在背，但程度还有不同：对常的处死决心下的早，而对杨还有些犹豫，同时又感到，如处决常而置杨于法外，杨必不服，还会别生枝节，不如一下剪草除根。因此才下最后决心，置杨、常于法。”杨、常同张家是多年袍泽，虽因情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在张在当时内心确实是极痛苦的。正如王家楨同志在他《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的文内所叙那样，处决杨、常之后，张便对他说：“咱们可得真正好好地干啦！若不然，那太对不起凌阁和翰襄在地下了！”这确是由衷之言。张同我们谈起这件旧事时，心情也是很沉重的。由于这一块银元，曾起过决定除掉奸雄，消灭隐患的决疑作用。所以事后张就把“它”保存在一个大铁柜内留作纪念。

我很同意王家楨同志在文章中的看法，张处决杨、常之后，交给他一大堆情报材料，都是有关杨、常秘密活动的情况。不难断定这些材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有计划地进行挑拨离间而制造出来的。我们知道，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对华政策，就是“助长内乱，分而治之”，特别是对东北这个地方，他们早已看成是囊中物，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侵略，真是无孔不入。证诸张同我们所谈关于决定杀杨、常的经过情况，可以断定杨宇霆和常荫槐被杀虽由于他们心怀叵测，别有野心，但是如无林权助在东京车站对新闻记者的讲话，纵使对杨、常怀疑痛恨，想把他们清除，自有许多妥善办法，不一定要采取这样手段，因此杨、常之死，林权助的讲话，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收买日本政友本党的一段秘密外交

张学良将军又谈到日本政友本党首脑床次竹二郎派代表来沈阳请求支援他们竞选事，当时索价是两百万元。张以兹事体大，乃同东北军政首脑人彻底商议。许多人都感觉日本这个强邻对我们节节进逼，重重压迫；特别是日本军人的蛮横无理，深感头痛，穷于应付。床次代表到沈来谈的条件，是这样的：假如能够支援一笔竞选费，政友本党就能够很有把握地获得这次国会选举胜利，将来出组内阁，保证日本政府对东北外交采取友好的态度，遵循正当外交途径来处理问题，决不采取军事威胁或运用任何暴力。我们经过商议，最后决定给床次的政友本党以经济支持，秘密进行，如能使日本对东北的外交关系得到暂时缓和，我们拿出一、二百万元的代价，觉得还是值得的。因此，当他们代表来沈时，即先付给五十万元。这个一张五十万元的收据，也一并保存在一大铁柜内。

张学良将军在同我们结束有关这“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的谈话时候，他说：“沈阳事变以后，日本占领军搜索我的住宅时，看见一个大铁柜内只放这两件小东西，一定会很感到奇怪。”是的，一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这两件事当作神秘来传说，莫衷一事。王家桢同志已经就他亲身的经历，把这两件事写了出来。现在我也把在三十年前亲身听到张学良将军所谈的情况补述在这里，对于这两件事情的内幕真象的了解，可能是有帮助的。王家桢同志说的很对，“这两件小东西实质上代表着有历史意义的两件大事”，因此我不惮辞费把它记录下来。

郭松龄反奉的片断回忆

鲁 穆 庭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郭松龄反奉时，我正在镇威第三方面军团充任军需处长，出席了他所召集的滦州会议。下面的记述大都是我亲自经历的，间有闻自他人者亦极少，惟事隔三十多年，记忆可能有所出入，尚望知者加以指正。

一、郭松龄与张学良的关系

郭松龄字茂宸，辽宁沈阳县人，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在广州军政府当过营长。一九一八年经秦华介绍回奉天，任东北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适张学良在讲武堂学习因与郭相识。张见郭生活朴素，工作认真负责，且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认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遂向乃父张作霖推荐，委为卫队旅第二团团长（张时任卫队旅旅长，卫队旅番号是东北陆军第三混成旅）。一九二一年八月扩编军队，郭即升充步兵第八旅旅长；郭就任旅长后，秉承张学良的意志，多方罗致人材，不论军官佐，凡是军事专业学校出身的都收入第三旅差遣队储才备用；遇所属部队各级军官佐出缺，即亲自选拔下一级优秀士官升补。此外，并设有军需教育班和军士教导队，以培养军事骨干人材。这些措施在提高东北军的素质上取得显著的成绩，因而受到部属的爱戴和张学良的进一步信任。当时三、八旅的事务一般均由郭松